



赫格居斯回忆录

——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

〔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赫格居斯回忆录

——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

[匈]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著

陈之骝 柴鹏飞 译

(内部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根据维也纳赫尔曼加斯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古 月

封面设计：丁 品

赫格居斯回忆录

——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 著

陈之骥 柴鹏飞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2 字数：265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012-0532-9/K·116 定价：8.0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匈牙利前总理赫格居斯·安德拉斯的回忆录。

赫格居斯·安德拉斯生于1922年。1942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1945—1947年任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书记；1948—1951年任党中央及政府农业部副部长、部长；1951—1956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1955年4月—1956年10月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1956年10月事件后一度在苏联生活，于1958年回国。1958—1959年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1963—1968年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63—1968年筹建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1973年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出党。

作者以与记者对话的方式叙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及从政生涯。由于作者是50年代匈党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在本书中提供了匈牙利党和政府的国内外活动的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可供外事工作者、研究人员在研究匈牙利当时国内外政策时作参考。

作者现已退休，继续从事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作者著作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及社会现实》、《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变化的世界》，以及《一个思想阴影下的生活》等多种。

1986/03

1

目 录

一、党的战士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离了队·····	1
二、华沙条约的签字人·····	15
三、根·····	30
四、接触共产党人·····	35
五、几个星期的监狱生活·····	52
六、莫斯科派建党·····	57
七、统一的青年组织——多党制·····	68
八、穿着两只不同靴子的土改部长特派员·····	72
九、开始了党的干部生涯·····	84
十、发生转折的两年间·····	86
十一、“蓝票”选举·····	88
十二、格罗的农业问题专家·····	91
十三、从近处看莫斯科回来的几位领导人·····	94
十四、监狱世界的开端·····	104
十五、别无选择·····	106
十六、解散人民学院联合会·····	110
十七、斯大林的党巩固自己的权力·····	111
十八、拉伊克案·····	120
十九、匈牙利的苏式大清洗·····	138
二十、政权的奥妙·····	145

二十一、斯大林主义的若干要点	160
二十二、兄长	167
二十三、“最好的父亲拉科西”	175
二十四、对抗的民族	179
二十五、恐怖机器	181
二十六、匈牙利党的禁区：犹太人问题	183
二十七、群众性恐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匈牙利 利古拉格	186
二十八、社会主义外交队伍	192
二十九、“匈牙利大跃进”	194
三十、老板之死	199
三十一、匈牙利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柏林起义	202
三十二、莫斯科决定之后	208
三十三、人民松了一口气，当局惶恐不安	217
三十四、对官运亨通的种种疑问	223
三十五、一次妥协的党代会及其后果	234
三十六、谁战胜谁？	236
三十七、损失惨重的胜利	243
三十八、在权力的顶峰	246
三十九、有限度的平反	254
四十、斯大林专制制度被揭露，拉科西遭废黜	264
四十一、新的恐惧：对人民的恐惧	272
四十二、去贝尔格莱德作卡诺莎之行，凯莱佩希公墓	277
四十三、我看到：人民过来了	286
四十四、告别权力，告别国家	311
四十五、革命——反革命——民族起义	315
四十六、在乌斯潘斯科耶的流亡日子	316

四十七、在莫斯科的自由生活	322
四十八、回到卡达尔主义的国家	326
四十九、权力再一次招手	339
五十、把社会学“走私”进马克思主义	344
五十一、旁观而不沉默	349
五十二、羞答答的修正主义者	352
五十三、东欧向何处去	356
五十四、杀手铜,开除出党	364
五十五、“Who are you, Mr. Hegedus?”	366
五十六、卡达尔制度的修正者	367
五十七、不多的退休金,紧张的活动日程	373

一、党的战士在四分之一世纪 后离了队

齐莱^①：共同的事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可是由于我们的经历和政治观点不同，对你和对我说来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我说来，赫格居斯是华沙条约的签字者，作为格罗^②最后的追随者，由于在1956年革命中叫来了俄国人，还曾经被我视为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事业的背叛者，是匈牙利人民的敌人，联系到那个时代，我看到，这位赫格居斯现在站到我们一边来了。

1968年8月21日，根据进行了勃列日涅夫式发展和运用的华沙条约，苏联——也包括匈牙利这位帮手——以武装消灭了布拉格自上而下发动的改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有两个基层组织谴责了这次武装入侵，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所支部，另一个是家具厂支部。

在社会学研究所（在那里你是所长，我是实习研究员）的

① 以下简称齐。——译者

② 格罗·埃尔诺（1898—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工作，去过法国、比利时、西班牙。1944年回国后，长期任党的政治局委员和政府副总理。1956年事件后至1960年在苏联，1962年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开除出党。——译者

党员大会上冯西克·久拉（我记得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长）代表中央委员会宣布给予研究所支部书记马尔库什·玛利亚以最严重的党纪处分：开除出党。马尔库什·玛利亚因为在南斯拉夫的一次哲学家集会上和他的丈夫哲学家马尔库什·久尔吉以及费赫尔·费伦茨和海勒·阿格奈什一起谴责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位受到大家爱戴的马尔库什·玛利亚听到这决定后痛哭失声。这决定激怒了本来就义愤填膺的与会者，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但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马尔库什·玛利亚，并且谴责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径。福德瓦里·托马什交回了党证，其余人表示“不同意”“谴责”这次干涉，或为之表示“忧虑”。

冯西克当时说，这些措词的分量是不同的。我问他，哪一个是最严重的措词， he 说是“谴责”。于是我说：“我谴责这次入侵。”

你当时作了简短、然而却是坚定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最重要，也是最应该予以肯定的印象。你说，你谴责对布拉格之春的践踏，你认为这是悲惨的。你说，在这件事中你痛感自己的责任。你认为你在拼凑华沙条约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1956年邀请俄国人，或者说使那次邀请合乎手续那件事是你一生中最严重的错误，也许是罪愆——我记不清你准确的措词了。

对你来说，那次你在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类似意义的声明也许更为重要。可是关于这点，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党外的匈牙利人对“我们的”党员大会可以有看法的话——那在“同志们”自己人中间说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只有在公开场合表示的态度才算数。而你在这里——社会学研究所支部大会上——在更广大的公开场合，在“老百姓”面前又重复

了你的立场。那时我看到，你彻底地同斯大林主义者的赫格居斯·安德拉斯决裂了。

现在，当我们决定在这没有限制的场合谈话，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怎样分析和评价1968年自己的这个行动的。

赫格居斯^①：我想，你说得对：1968年8月，无论是在党中央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还是社会学研究所支部会上的赫格居斯和1955年5月签订华沙条约时的赫格居斯完全是两回事。

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离经叛道的变化，这个过程持续了10年多。它基本上是1956年11月开始，在1968年8月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然，对我说来，那次在中央委员会总部举行的会议比在社会学研究所里的那次党员会议更为重要，而且我也记得更清楚。中央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上邀请了匈牙利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记者、作家、大学教授、研究所长等。那时我是直属中央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成员。我以这个身份，还作为大学教授和研究所所长得到邀请去参加这次情况通报会。

齐：准确地说，这次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

赫：就在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当天——1968年8月21日早晨。欧瓦里·米克洛什在会上的讲话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欧瓦里当时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阿采尔·久尔吉一起，也是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领导人。是他向差不多200个与会者做报告。

齐：就是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召集这次会的吗？

赫：是为了这件事。我记得我们是头天晚上接到通知。

① 以下简称赫。——译者

就是说，这是个匆匆召开的非常集会，事先没有计划到。

欧瓦里简要地——按照苏联的观点——介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来论证华沙条约 5 个缔约国的军队——罗马尼亚没有参加——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必要性。

在听完介绍以后我请求发言：非常坚决，毫不含糊地谴责了这次行动。并且简要地分析了它所能带来的消极后果，我说，我要就此事给中央委员会写信。

名作家道尔瓦什·约瑟夫坐在我旁边，他当时还是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我们俩关系很好。当我发完言后，坐下来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安德拉什，你说的都对，我都同意。可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在这一说这些？”我对他说——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回答你的问题——这就是所谓“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原来明确地支持布拉格之春，对它充满了希望，因此对于匈牙利部队参加镇压布拉格之春不能漠然置之。

齐：别人也在会上发了言吗？

赫：只提了一些表面的、探询性的问题，像“在报刊上我们该怎么做？”之类。

齐：对你的发言欧瓦里是什么反应？

赫：他说，我尽管写信，可以直接寄给中央委员会。我当然这样做了。在会上阿采尔作了回答。他的讲话基本重复了党中央认为为什么要侵犯捷克斯洛伐克，也就是，用他们的话叫做“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积极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原因。阿采尔强调：他们并不乐于这样做，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痛苦的步骤。

齐：在开完积极分子会议之后，你的感觉怎样？轻松，还

是恐惧？

赫：确确实实地轻松。我还应该补充一点，我的一部分朋友——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也参加了南斯拉夫的那次哲学讨论会，在一张法国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也谴责了这次入侵。党的领导在我和这些人之间作了区别。他们说：我是在党的讲坛上发表意见的，合乎党的原则，而这些人都在一张资产阶级报上向党发难。

所以我没有受到党纪处分。后来在几个月之后，当撤消我的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的时候并没有把我的这次行动作为理由。

齐：可是在布达佩斯第一区区党委却是以这件事由发动了反对你的运动。他们试图说服我们研究所的党员起来表白，是因为受了研究所所长的影响和慑于他的威望而没有进行反对他的行动。也就是说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在撵走你的行动中效犬马之劳。不过让我们回到实质问题上来：事实上，你的行动超越了党性所规定的框框。

赫：是的，因此我们得回到另一个问题上来：我在这时候——1968年8月——和1955年签订华沙条约的时候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从斯大林主义的党干部变成了自主思考问题的人。

齐：虽然你批评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没有直接引起被开除出党的后果，但如果想得远一点，造成你这30年党龄的党员被收回党证这后果的终究还是那件事。

赫：但我还是认为，我1973年遭到开除——至少它的直接原因——不是1968年的那次行动。从那以后的5年中我在大学教书，在当时很流行的经济管理方面的讲座上做了不少报告。固然，我的讲座凡是受到欢迎的，一般都被迫中断，但

这不能算是对我举起了杀手锏，因为那段时间里我出版了两本书，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可以说，我在活动，而且很积极。

造成我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是1972年11月的一些事。那时在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出现了一个“反改革派”，即所谓“工人反对派”。我之所以把它叫做“所谓”，是因为它的成员并不是工人，而是些工会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党内一些中上层干部。这些人不但尖锐地攻击经济改革，而且还攻击所谓“自由化文化改革”，攻击这个政策的最有代表性的领导人阿采尔·久尔吉。当这个“反改革派”取胜了，被攻击的文化政策的领导人为了表示他们是能够严肃处理问题的，便抛出了所谓“布达佩斯学派”开刀。这个被叫做“布达佩斯学派”的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没有卢卡奇^①的卢卡奇学派，因为卢卡奇本人在头一年去世了；另一部分是批判社会学派，主要以我为代表。这两部分人无论是具体的人还是从研究的方法来看，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

至于为什么要把“布达佩斯学派”当靶子，这里面西格蒂·约瑟夫起着重要的作用。西格蒂在50年代初还是卢卡奇的学生，后来1956年与老师反目，于是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西格蒂在70年代初给中央委员会送交了一份报告，同时也是给莫斯科看的。这份报告的中心意思是说：60年代末，匈牙利在卢卡奇·久尔吉和赫格居斯·安德拉斯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修正主义派别”。这个派别——西格蒂这样写——把匈牙利知识界，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置于恐惧之中。西格蒂认为，这个局面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

^①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政治家。在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任教育人民委员。1956年纳吉·伊姆雷政府中任教育部长。——译者

阿采尔·久尔吉支持这个派别。

作为这个指责的回答，阿采尔在1973年1月的意识形态会议上尖锐地攻击了没有卢卡奇学派和以我为首的批判社会学派。他想表明，他不但没有支持修正主义派别，相反，是他带头肃清它的影响。

齐：也就是说，在1973年的那次清洗是阿采尔具体执行的。他是出于恐惧？

赫：是他执行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恐惧。我想，领导干部所考虑的，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也许可以说，他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文化政策而进行这场清洗的。阿采尔在那以前确实既没有支持过卢卡奇的，也没有支持过赫格居斯的修正主义。他在国内执行了一条非常古怪的，充满矛盾的，然而仍然是自由化的文化政策，他也许是为了保卫这政策而攻击和清洗“布达佩斯学派”的。应该说，这条文化政策包括它的消极因素在内，与邻近的东欧国家相比，给予文化艺术家和欣赏者的活动余地要大得多。

齐：让我们回到你自己身边，谈谈你的观点是怎样形成的。你告别了过去，开始了自己的新生，这会是很困难的，但究竟是怎样的过程？

所谓新生，我们的理解是：遵循匈牙利的，不是斯大林主义的，不是拉科西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卡达尔主义的原则。我从正面再说一遍：要匈牙利国家的，做匈牙利人民利益的代表，只要有可能，就选择民主，拒绝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民的代表。

我向你提问，因为你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是一位匈牙利政治家，你可以有机会不仅向国内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向世界的舆论发表看法。

我们的这次谈话——我们共同的作品——按照你的本意是对着没有限制的舆论界进行的，主要是记你的活动。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你的谈话。我争取尽量说得少些。但在这里，在我们谈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要谈谈我的态度。你正在承担一件在匈牙利从未也没有人承担过的事，这点我很清楚。我为你担心，因为我始终认为你很天真，好像直到今天还处在一个思想的魔法影响下，好像30年以后，你仍然在斯大林去世时出现的缓和时候一样，不能衡量真实的危险。你想一想：友谊来，友谊去，你此刻正在向一个反共的人回答问题。

那么现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让我来谈谈我们的担心。我了解共产党那个制度在怀疑你同时具有民主思想的匈牙利反对派怀疑你，一部分西方舆论也怀疑你。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中，你是怎样估计自己的角色？你在和谁一起？

赫：我认为这两种怀疑都有各自的实际原因，因为我小心翼翼地保卫着自己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取到的自主。甚至在意大利的佩鲁贾国际和平大会。我和正式的匈牙利代表团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也没有放弃它。我在会上讲话的实质正好就是对匈牙利和平运动最有代表性的民主反对派代表未能与会表示遗憾。

同时我不仅愿意和阿采尔·久尔吉对话——1983年他要求这样做，而且还非常高兴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了他——虽然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

另一方面，匈牙利官方不会对我以自主的方式就世界和我国的事情发表看法感到高兴，也是很自然的。因此，我的态度使两个方面都引起怀疑应是意料中的事。

齐：为什么他们放你到西方去旅行？

赫：这旅行不简单。譬如说1972年和1976年之间我不能出国旅行。从那以后就可以了。先是每年可以出国一次，后来一年可以两次。而现在，1984年，打破纪录，今年我是第4次到西方来了。今年我的第2次旅行是到联邦德国。我接到9个大学的邀请去演讲。3月初我申请出国许可。按规定一个月应该批下来，可是直到6月5日许可才到我手里，那时我早打电报通知人家把最后一个报告也谢绝了。匈牙利的大学在6月初就没有什么活动了。他们大概以为在西德也是这个情况。这样，就把许可发给了我，以为反正我已经没法利用了，可是他们不知道西德的夏季教学直到7月份还有。所以虽然我没能做9个演讲，但还是做了8个。

还有另一件事也说明这些旅行并不那么简单。我是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前来的。非常轻松地过了边界。我当时想，近十年来这样的事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然而刚过边界，我看到那个给我护照盖章的小边防警察向火车跑来，还跟着一个大尉也许是少校。他们喘着气进了火车包间问：“您是赫格居斯·安德拉斯吗？”我说，是的。然后他们要走了我的护照和出境许可，走了。直到一个小时以后才还给我。火车就一直停着。当然，火车也许原来就该停。他们向我表示歉意，解释道，许可证上有一个地方“弄错了”，只好打电话和布达佩斯核实。

关于我在国内做报告的情况也充满类似的矛盾。我收到的邀请越来越多。譬如去年12月，德布勒森的经济大学请我做两次报告，一次在拉伊克学院，另一次在政治俱乐部。这事需最高一级，即中央书记处批准。他们说，一个月里做两次报告太多了。匈牙利文化界连这点分量也承受不了！12月我还是做了一次报告，另一个则推迟到了2月。

还有一个挺说明问题的事：去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拜兰德·

特·伊万^①给我打来个电话，万万没有想到，他请我在科学院于5月举行的年会上作一次演讲，内容是“经济与道德”。我准备好了讲稿，在奥地利大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和拜兰德·特·伊万也见了面。我问他，是不是重新考虑过这次邀请了？他安慰我道：“你尽管准备，这事没问题。”

于是我把讲稿书写成文，交给了科学院。4月份，科学院给我打电话，说是对不起，我没法做这个报告，这是上级定的。

齐：那就是说拜兰德起初是自作主张，谁也没问。

赫：不，他肯定问了有关部门，只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有人插了手。可能是阿采尔同意了，而别人下了禁令。我问，是不是对讲稿内容有意见？那边说，不是，因为下禁令的人根本没有见过讲稿。显然，这里又是“杀手锏”在起作用了。科学院里的人发表意见说：如果有关部门看了这个讲稿的话，那更得禁止宣读了。

还有一件事，4月份我得到到工会学校做报告的邀请。上面决定我可以去，但对象只能是工会干部。这点我不大懂，因为工会学校除了工会干部还可能有什么人呢，也不会从街上请人去听报告……后来在报告前两星期通知我，他们重新考虑了这件事，我不能做这个报告。从那事以后，现在每当有人请我做报告，我总是问：征得上级机关的同意了没有？

齐：现在出现了那样一种特殊的情况：在国内他们不太愿意让你对群众讲话。对于你向西方群众讲话他们倒并不很在乎。你则通过出国旅行、对国外听众讲话来鼓吹匈牙利现行

^① 拜兰德·特·伊万(1930—)，当时是匈牙利科学院院长。——译者